

# 明清碑文論叢

## 第一輯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明清碑論叢

第一輯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明清研究論叢. 第1輯 / 梁樹風等著;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5325-7810-8

I. ①明… II. ①梁… ②香… III. ①文史哲—中國—明清時代—文集 IV. ①C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229982 號

## 明清研究論叢(第一輯)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mailto: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http://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啓東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635 × 965 1/16 印張 29.75 插頁 2 字數 428,000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50

ISBN 978-7-5325-7810-8

I · 2970 定價: 8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編輯委員會

華 瑋 張 健 周建渝 陳煒舜 徐 瑋

編輯助理

胡光明

# 目 錄

|                              |     |        |
|------------------------------|-----|--------|
| 清初詩壇尋“真”對陶詩評價的影響 .....       | 梁樹風 | ( 1 )  |
| 從盛唐杜甫到北宋蘇軾                   |     |        |
| ——以遣詞用典的量化統計論證柳如是詩風的嬗變       |     |        |
| .....                        | 孫賽珠 | ( 23 ) |
| 吳喬《圍爐詩話》與《逃禪詩話》成書先後之探討 ..... | 周瑞冰 | ( 37 ) |
| 文學典範與師法對象：論汪琬的古文譜系與古文創作      |     |        |
| .....                        | 李向昇 | ( 71 ) |
| 《石洲詩話》在翁方綱詩學中的理論價值 .....     | 何繼文 | ( 99 ) |
| 詞章如何成學：姚鼐與清前中期書院的古文教育 .....  | 胡 琦 | (123)  |
| 範於才性，歸於融合                    |     |        |
| ——袁枚與章學誠文論比較 .....           | 黃永順 | (171)  |
| 重歸唐宋宗風                       |     |        |
| ——論《飲水詞》、《憶雲詞》的藝術風格與詞學意義     |     |        |
| .....                        | 吳志廉 | (201)  |
| 同光體和閩派的奠基：論陳衍《近代詩鈔》的詩學建構     |     |        |
| .....                        | 黃小蓉 | (229)  |
| 論潘飛聲德國時期之文學創作 .....          | 程中山 | (265)  |

論況周頤“詞外求詞”的概念及其對詞人與詞作關係的

處理 ..... 徐 瑋 (305)

論王國維詩歷史感的分期 ..... 朱寶盈 (333)

王國維援心理學入詞學探析 ..... 許明德 (347)

京華不是舊京華,莫向東陵問種瓜

——溥儒、溥傑遊觀詩詞中的故國意象 ..... 陳煒舜 (365)

竹添進一郎、岡千仞與晚清士人的漢文筆談

——以《棧雲峽雨日記》和《觀光紀游》為中心 ..... 葉楊曦 (397)

外籍教士與晚清兒童課餘圖書 ..... 謝雋晔 (425)

# 清初詩壇尋“真”對陶詩評價的影響

梁樹風

**提要：**清初是陶學史上的一高峰，其時擬陶、和陶、評陶者甚衆，致有“近日詩人殆無不和陶者，且掇輯爲近體，曰陶律”的盛況。當然，這現象與明清易代之際文人推崇陶淵明耻事二姓的志操不無關係；但清初詩學的傾向與轉變，也深深影響清初陶學的發展與面貌，尤其是當時詩壇追尋“真詩”的風氣，更是直接影響着清初文人對陶淵明其人其詩的評價。

在這種風氣下，陶詩的“真”在創作態度、詩歌底蘊，以至詩歌表現方面都得到廣泛的討論，並逐步奠定了“真詩”的典範地位。但同時，向爲文人稱賞的《乞食》一詩，也因着這一緣故，被冠以“惡詩”的污名。

**關鍵詞：**明末清初 陶淵明 陶學 詩學

## 一、引言

清初文人對陶淵明其人其詩的討論可謂空前熱烈，而且早已脫離了陶淵明易代節操的討論。尤其是在詩學上，不少仕清文人如王士禛（1634—1711）、朱彝尊（1629—1709）、葉燮（1627—1703）、施閏章（1619—1683）等都非常欣賞陶詩，如葉燮便謂陶淵明“胸次浩然，吐棄人間一切，故其詩俱不從人間得。”<sup>①</sup>施閏章亦謂陶淵明：“有邁世遺物，

① 葉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頁63。

泰然自得之意，故其詩不字雕句琢，而讀之超舉，蓋非徒事詩也。”<sup>①</sup>究竟陶詩有何絕妙的地方能够吸引着清初這些出處相異的文人爭相討論？而這種風氣又如何影響着他們對陶詩的欣賞與評價？下文將以“真詩”為綫，逐一剖析這種現象與其背後的成因。

## 二、清初詩學背景

清初詩學主要是延續明末公安、竟陵對前後七子模古的反對，提出抒寫性靈、直抒胸臆為中心的詩學評價，然而對於公安、竟陵末流陷於俚淺僻澀之弊亦有所批評。張少康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中便嘗把明末清初詩文理論的傾向歸納為三點：一、立足於前後七子、傾向復古，不贊成公安、竟陵的文學主張，但又不是簡單地承襲和延續七子的老路，而是吸取了公安派提倡抒寫真情的方面，反對其在內容上和文辭上的鄙俚、淺俗，提倡學習秦漢之文和盛唐之詩，但又反對模擬因襲，要求文學起到積極的社會教育作用；二、立足於公安派的性靈說，反對前後七子的復古模擬主張，但也反對竟陵派的幽深孤峭，而又強調要學習古人的長處；三、贊同公安派的抒寫真實性情之說，而又不同意對性情不加規範地任其自然發展，主張文學要描寫具有深刻社會內容的真實性情。<sup>②</sup>從這段論述大致可見，明末清初的詩壇主要有三個方向：一、抒寫真性情，反對盲目模古；二、反對過分幽深孤峭的寫作手法；三、要求具有深刻的社會內容，有益於世。

### （一）前後七子的模古

明中葉以後，前後七子風靡詩壇，他們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sup>③</sup>

① 施閏章：《琴齋詩序》，《學餘堂集》，《四庫全書》，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七，頁16。

② 詳見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版），頁223—224。

③ 按：《明史·李夢陽傳》記：“夢陽才思雄鷲，卓然以復古自命。弘治時，宰相李東陽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夢陽獨譏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詳見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版），總頁7348。

擬古風氣盛極一時。他們刻意古範，鑄形宿模，當時論文談藝之士，鮮不奉爲圭臬。《明史·文苑傳》便云：“弘、正之間，李東陽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聲館閣。而李夢陽（1472—1530）、何景明（1483—1521）倡言復古，文自西京、詩自中唐而下，一切吐棄，操觚談藝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詩文，於斯一變。”<sup>①</sup>然而這種過分着重對盛唐詩歌的模仿，往往窒礙作家的性情，文辭因而不暢。公安、竟陵的崛起，就是要針對這一點。然而正如吳宏一在《清代文學批評論集》中所言：“‘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一直到清初，搦管操觚之士，推崇七子，以擬古相尚的，仍然不乏其人。”<sup>②</sup>故吳喬（1611—1695）便批評這些文人只偏重詩歌的外表而失却詩中的“意”：“弘、嘉之復古者，不知詩當有意，亦不知有六義之孰存孰亡，惟崇聲色，高自標置。”<sup>③</sup>錢謙益（1582—1664）更謂前後七子的摹擬直如剽賊，毫無個人的情感可言：“牽率模擬剽賊於聲句字之間，如嬰兒之學語，如童子之洛誦，字則字，句則句，篇則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sup>④</sup>

## （二）公安竟陵的俚淺

公安、竟陵的出現，本是要對前後七子模古風氣撥亂反正。然而他們專主性靈，或以清綺婉麗爲工，或以淒清幽眇爲能，因而風行未久，即流於俗誕之弊，且無觀於詩教。<sup>⑤</sup> 錢謙益便指出：“（袁宏道〔公安派〕）機鋒側出，矯枉過正，於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滅裂，風華掃地。竟陵代起，以淒清幽獨矯之，而海內之風氣復大變。譬之有病于此，邪氣

① 詳見《明史》，總頁 7307。

② 詳見吳宏一：《清代文學批評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頁 76。

③ 按：吳喬認爲詩的精神在於“意”：“人心感於境遇，而哀樂情動，詩意以生，達其意而成章，則爲六義，《三百篇》之大旨也。”詳見吳喬：《圍爐詩話自序》，《圍爐詩話》，載郭紹虞主編：《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版），頁 469。

④ 錢謙益：《李副使夢陽》，《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第1版），頁 311。

⑤ 按：陳廣宏《竟陵派研究》指出竟陵派的作品實際上也不乏關心社會現實的內容，但他們的創作多表現出“幽情單緒”、“孤懷孤詣”的趣尚，更多是自我內心“虛懷”、“幽顯”之呈露，體現的是衰瀟、涼薄的徵象，距離那些主張詩歌須憂時托志、有助教化的正統士大夫對詩歌的功用要求還相差太遠。詳見陳廣宏：《竟陵派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版），頁 486。

結轡，不得不用大承湯下之，然輸瀉太利，元氣受傷，則別症生焉。北地、濟南，結轡之邪氣也；公安瀉下之，劫藥也；竟陵傳染之，別症也。”<sup>①</sup>王夫之(1619—1692)更直指竟陵派無關風雅之弊是亡國之音：“自竟陵乘間位以登壇，獎之使廁於風雅。乃其可讀者一二篇而已。其他牒者如青樓啞謎，黠者如市井局話，蹇者如閩夷鳥語，惡者如酒肆拇聲，澀陋穢惡，稍有須眉人見欲噉。而竟陵唱之，文士之無行者相與敦之，誣上行私，以成亡國之音，而國遂亡矣。竟陵滅裂風雅、登進淫靡之罪，誠爲戎首。”<sup>②</sup>

是以清初文人在總結明代的詩學時，往往咎病於前後七子、公安、竟陵之弊，認爲均未得詩學之要旨。尤侗(1618—1704)便謂：“若夫今之詩人，矜才調者守歷下、瑯琊爲金科，鑿性靈者尊公安、竟陵爲玉尺。究之浮華熠燿，如繡蜉蝣之衣；虛影菟苗，若刻羚羊之角，兩者交病而已。”<sup>③</sup>在這環境底下，實有需要一種除弊補闕的詩學理念以扭轉這種詩學的劣勢，而儒家的詩教觀便成爲了清初文人的良方。

### (三) 儒家詩教觀的復興與真詩的涵義

清初文人討論詩作的“真”，很多時候就是建基於儒家的詩教觀來論述，魏象樞(1617—1687)在《重經學端士習正文體議》中便指出先要有真學問，然後纔能有真心術；有真心術纔能有真品誼，這樣纔能寫出“真文章”來。而這些“真”的源頭，便是儒家的經典——《六經》：“夫人有真學問，然後有真心術。有真心術，然後有真品誼，然後有真文章，真

① 錢謙益：《袁稽勳宏道》，《列朝詩集小傳》，頁567—568。

② 王夫之：《古詩評選》，《船山全書》（長沙：岳麓書社，1996年，第1版），第14冊，頁617。

③ 尤侗：《蔣虎臣詩序》，載尤侗著，趙譽船評：《西堂雜俎二集》（上海：中華書局，1927年），卷二，第13頁。按：對於“前後七子”與“公安三袁”間衝突的“二分法”，周質平提出異議，認爲“爲了要強調七子的保守與三袁的激進，就勢必要突出模擬與性靈之不同，結果前後七子個個成了不近人情的頑固分子，而袁氏兄弟則成了極端的革命黨，只要七子所主張的，他們一概反對。在這樣的安排下，七子詩論中較爲自由開明的一面固然被忽略了，而三袁理論中，較爲保守的意見也被輕輕的放過了。”詳見周質平：《公安派的文學批評及其發展——兼論袁宏道的生平及其風格》（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4。周質平以現代的目光審視兩派的關係，固然有其可取之處；然而在清初學者“撥亂反正”的旗幟下，正正就是要將兩者的極端顯露出來，以展示出他們“新”詩論的優勝。

幹濟。其大原皆本於《六經》。”<sup>①</sup>

### 1. 清初儒家詩教觀的復興

本來一國的興亡，早已引起文人學者的反思；何況以明朝二百多年的基業，對滿清入關顯得束手無策，完全沒有抵抗的能力，那就更觸動了文人學者的心靈。在這歷史環境下，文人學者開始思索晚明學術“束書不觀”、<sup>②</sup>“師心妄作”等空疏的問題，<sup>③</sup>並逐步走向經世的“實學”思潮。<sup>④</sup>顧炎武(1613—1682)在《日知錄》中便有“文須有益於天下”一節，其云：“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sup>⑤</sup>在詩亦然，黃宗羲(1610—1695)在《黃孚先詩序》中便認為詩的情感可以貫金石、動鬼神，撼人心魄，故詩不可以溢言漫辭、亦不可以諂笑柔色：“情者，可以貫金石，動鬼神。古之人情，與物相遊而不能相舍，不但忠臣之事其君，孝子之事其親，思婦勞人，結不可解，即風雲月露、草木蟲魚，無一非真意之流通，故無溢言漫辭以入章句，無諂笑柔色以資應酬。”<sup>⑥</sup>錢謙益更斬釘截鐵地道：“詩道大矣，非端人正士不能為，非有關於忠孝節義綱常名教之大者亦不必為。”指出必需具備儒家忠孝節義、綱常名教的內容方可以為詩。

### 2. 清初“真詩”的涵義

明末清初，矯言偽行之士充斥，要判斷“詩作”是否“真”，是否“有意義”的時候，還要從“其人”着手。歸莊(1613—1673)在《天啓崇禎兩朝

① 魏象樞撰，陳金陵點校：《寒松堂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1版），總頁592。

② 全祖望：《甬上證人書院記》云：“先生當日講學頗多疑議之者，雖平湖陸清獻公尚不免。不知自明中葉以後，講學之風已為極敝，高談性命，直入禪障，束書不觀，其稍平者則為學究，皆無根之徒耳。”詳見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版），總頁1059。

③ 顧炎武在《豐熙偽尚書》中嘗言：“近代之人，其於讀經，鹵莽滅裂，不及昔人遠甚；又無先儒為之據依，而師心妄作；刊傳記未已也，進而議聖經矣；更章句未已也，進而改文字矣。此陸游所致慨於宋人，而今且彌甚。”詳見顧炎武著，陳垣校注：《日知錄》（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版），頁112。

④ 按：呂元聰、葛榮晉在《清代社會與實學》一書第六章《清初的經世實學思想》有專文探討，在此不便贅言。詳見呂元聰、葛榮晉：《清代社會與實學》（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83—130。

⑤ 顧炎武著，陳垣校注：《日知錄》，頁1043。

⑥ 黃宗羲：《黃梨洲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版），頁343。

遺詩序》中便言：

《傳》曰：“詩言志。”又曰：“詩以道性情。”古人之詩，未有不本於其志與其性情者也。故讀其詩，可以知其人。後世人多作偽，於是有離情與志而為詩者。離情與志而為詩，則詩不足以定其人之賢否，故當先論其人，後觀其詩。夫詩既論其人，苟其人無足取，詩不必多存也。<sup>①</sup>

歸莊指出，若然其人無足觀，則其詩亦不必觀的概念，大抵就是清初文人在討論詩是否“真”的先決條件。故錢謙益在《明處士楊君無補墓誌銘》便指出，需要有處士之節操方可成為“真詩人”：

天下有處士而後有真詩人。真處士而不為詩人者，則有之矣。真詩人而不為處士，未之有也。為詩人者，服處士之服而無其志，其為詩也，傭雇而已矣。<sup>②</sup>

在這種蘊藏人品的“真詩”底下，“真詩”的意涵便與儒家的詩教觀等量而齊。杜濬(1611—1687)在《奚蘇嶺詩序》中便謂“夫真者必歸於正，故曰正風正雅，又曰變而不失其正。詩至今日，不能不變，道在不失其正而已”。<sup>③</sup>

故清初文人對於“真詩”甚為重視，認為詩作之妙處、精處都能以“真”道之。方文(1612—1669)在《吳興贈嚴修人進士》便謂：“詩文妙處惟一真，真之至者能通神。”<sup>④</sup>申涵光(1620—1677)《喬文衣詩引》亦謂：“詩之精者必真，夫真而後可言美惡。”<sup>⑤</sup>由此可見，清初文人提倡的

① 歸莊：《歸莊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版），頁181。

② 錢謙益撰，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1165。

③ 杜濬：《變雅堂遺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94冊，影印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年（1894）黃岡沈氏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一，頁2。

④ 方文撰，胡金望、張則桐校點：《方蘊山詩集》（合肥：黃山書社，2011年），頁710。

⑤ 申涵光：《聰山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07冊，影印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初版），卷二，頁8。

“真”，與公安竟陵所提出的“真”的不同，乃在於清初文人所言“真”的背後需要附以儒家的詩教觀以及人品這兩個重要元素。

### 三、清初“真”詩的內涵與陶詩的評價

隨着清初追求“真詩”的聲音越來越高漲，清初文人評詩的時候也多以“真”為判斷美惡的標準，如魏禧(1624—1681)《唐邢若詩序》便云：“不假學問而能工者，意真也。人無真意，而求工於詩，辟猶附塗而粉澤之，施以繪彩，則幾何其能久也？”又云：“天下能詩者多，能真詩絕少。”<sup>①</sup>在評詩的過程中，陶淵明的“真”往往得到清初文人的垂青，如李鄴嗣(1622—1680)在《錢退山詩集序》便云：“夫詩本于性情，感于物而後動。和平溫厚，此性情之正也，然後動于哀樂，斯形于音，使人詠之而其聲逾長，玩之而其味愈淡而不厭。……《三百篇》以降……晉人惟陶公。”<sup>②</sup>綜觀清初文人論述，大致可從情、理、意、詩四方面考察。

#### (一) 真情

“真情”的提出主要是針對前後七子語言上的模古，申涵光《與張逸人覆輿》嘗云：“我行天下久，粗能辨美惡。大復與空同，<sup>③</sup>文章備矩矱。其餘多瑣細，真詩久寂寞。”<sup>④</sup>指出前後七子之詩徒有外在的法式，內在情感則顯得甚為瑣細，欠缺聯繫，所以不能稱作“真詩”。

##### 1. 直抒胸臆

過分着重規摹前人語言，必定壓抑己身的性情，詩作由之不能暢所欲言。朱彝尊(1629—1709)嘗謂：“一心專事規摹，則發乎性情也淺。惟夫善詩者，暢吾意所欲言，為之不已，必有出於古人意慮之表者。”<sup>⑤</sup>在

① 魏禧著，胡守仁、姚品文、王能憲校點：《魏叔子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1版），頁468。

② 李鄴嗣著，張道勤校點：《杲堂詩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版），頁417。

③ 按：“大復”指何景明《大復集》；“空同”指李夢陽《空同集》。何、李二人均是前七子的成員。

④ 陶樸輯：《國朝畿輔詩傳》，《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681冊，影印山東省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九年（1839）紅豆樹館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9。

⑤ 朱彝尊：《憶雪樓詩集序》，《曝書亭集》（臺北：世界書局，1964年，初版），頁478。

清初文人眼中，陶淵明可謂深得自然之旨趣，純任自得，直抒胸臆，如王士禛(1634—1711)便言：“陶淵明純任真率，自寫胸臆。”<sup>①</sup>這種意態，更多反映在陶淵明那種給人“率爾成詩”的印象。賀貽孫(1605—1688)在《詩筏》中便舉陶淵明《五柳先生傳》“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為證，指出陶淵明作詩純粹只是抒發己懷，毫無一點作偽，故所以“真”，所以為高：

彭澤悠然有會，率爾成篇，取適己懷而已，……彭澤作《五柳先生傳》云：“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其《戒子書》云：“少來好書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味“自娛”二字，便見彭澤平日讀書作詩文本領，絕無名根。而所云“開卷有得”，所得何事，豈從字句間矜創獲者哉。且以區區樹蔭鳥聲，遂與開卷同一冥會，則其開卷時已置身在空明之內，耳目間別有見聞，其視樹木交蔭，皆自然之文章，而時鳥變聲，皆自然之絲竹也。所謂“悠然見南山”，豈虛語哉！大抵彭澤乃見道者，其詩則無意於傳而自然不朽者。<sup>②</sup>

這種“取適己懷”的創作，大抵是來自《詩大序》所言“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的傳統，<sup>③</sup>而這種個人的“情志”，往往是有感於世事而發，當中“豈從字句間矜創獲者哉”明顯便是針對前後七子與竟陵派過分精鍊於文字句法而發出的，以說明“真詩”應出於自然。

同樣處於易代之際，清初文人尤能感受到陶淵明在詩文中所寄之懷、所寓之事，感悟到陶詩中的真摯性情。傅占衡(1608—1660)《清暇吟序》便指出“真詩”的要點在於抒發性情，而陶淵明正是因為處於晉宋

① 王士禛著，張宗柟纂集，夏閔校點：《帶經堂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頁829。

② 賀貽孫：《詩筏》，載《清詩話續編》，頁159。

③ 《詩大序》，載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龔抗雲、李傳書、胡漸遠、肖永明、夏先培整理：《毛詩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版），頁7。

易代之間，心中有所鬱結，有會而作，因其所遇而置之於言語間：

詩以道性情，惟高閑者近之。高，其分也。閑，其遇也。兩相遂而真詩興焉。其人故難。余往按古今隱逸之詩，冠陶元亮而王無功次之。元亮得酒而酣，有會而作，日月既久，紙幅自多。無功詩文，高妙，其自言曰不必與夫悠悠閑人相唱和也。此二子者，全乎高矣。然適處晉宋隋唐之間，猶得盡年於江濱河渚，從容翰林，死而言立，望古料今，則是其遇，可不謂優乎！<sup>①</sup>

另一方面，清初文人亦欣賞到陶淵明不室礙自己的性情，不作“矯情”之語。杜甫(712—770)嘗嘲諷陶淵明“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是“未能達道”，<sup>②</sup>“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sup>③</sup>但在清初文人眼中，這種未能釋懷的情感正正是陶淵明所以為真、所以為近之處。<sup>④</sup>朱彝尊(1629—1709)在感同身受之際，寫下了《題亡兒書陶靖節文》，明白到陶淵明這種不矯情的“真”其實也是他達道的表現：

康熙己卯(1699)三月，從吳門借鈔雪山王氏《紹陶錄》，歸示亡

① 傅占衡：《清暇吟序》，《湘帆堂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65冊，影印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活字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卷三，頁1。

② 陶淵明：《責子》，載陶淵明著，陶澍集注：《陶靖節集注》(臺北：世界書局，1956年)，頁51。

③ 杜甫：《遣興·其三》，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1版)，頁563。

④ 按：前人嘗論及杜甫譏陶淵明之說，多認為此論過苛，並指出杜甫亦未能忘情，然而鮮有從“真”的角度來審視陶淵明此詩。如宋葛立方《韻語陽秋》云：“杜子美論之曰：‘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然子美於諸子亦未為忘情者。子美《遣興》詩云：‘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明游潛《夢蕉詩話》亦云：“子美乃嘲之云：‘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豈直欲置之度外，若秦之視越人之肥瘠，漠然不以為意歟？顧復自譽其子曰：‘驥子好男兒。’何亦不免於可嘲也。大抵子美借此見淵明懷抱，舉天下物無一係繫，其不能忘者，只此天性之愛耳。”詳見葛立方：《韻語陽秋》，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上海圖書館藏宋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版)，卷十，頁4；游潛：《夢蕉詩話》，《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416冊，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清康熙修補夢蕉三種本(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初版)，頁39。

兒，伏枕讀一過，作而曰：“少陵野老譏陶公未必能達道，非篤論也。”<sup>①</sup>

## 2. 人情之真

在審視明朝滅亡的原因時，清初文人大多痛恨並批評那些言行不一，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虛偽文人。這種評論雖然與前後七子、公安、竟陵的詩學主張並無直接關係，然而在清初的詩學上，這種人情的真偽問題，可謂佔了相當重要的一席。陶淵明雖然淡然若忘於世，然而在詩文中，我們不時可以看見他那種不能自止的感憤情懷。正如朱熹(1130—1200)所言：“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sup>②</sup>顧炎武(1613—1682)認同朱熹此論，認為陶詩在平淡底下，是潛藏着豪放的情懷，時而不能自止地流露出來，而這些詩文，也正正表現了陶淵明為人之“真”：

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慚，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魯連、斗量王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則其人之真偽，即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其汲汲於自表暴而為言者，偽也。<sup>③</sup>

葉燮(1627—1703)亦針對當時“人情彌巧”的問題，提出“詩是心聲”之論，認為作詩不可以“偽”，不可違心而出。他認為，偽詩偽文即使能欺人於一時，亦不能盡欺天下後世；而陶淵明素心之語，正是“應聲而出”的真性情代表：

① 朱彝尊：《曝書亭集》，頁633。

② 朱熹撰，朱明等校點：《朱子語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卷一百四十，總頁4323。

③ 顧炎武：《文辭欺人》，《日知錄》，頁1058。

詩是心聲，不可違心而出，亦不能違心而出。功名之士，決不能為泉石淡泊之音；輕浮之子，必不能為教龐大雅之響。故陶潛多素心之語，李白有遺世之句。……凡如此類，皆應聲而出。其心如日月，其詩如日月之光。隨其光之所至，即日月見焉。故每詩以人見，人又以詩見，使其人其心不然，勉強造作，而為欺人欺世之語；能欺一人一時，決不能欺天下後世。究之閱其全帙，其陋必呈。其人既陋，其氣必荖，安能振其辭乎！故不取諸中心而浮慕著作，必無是理也。<sup>①</sup>

“真情”的提出，是清初詩學中普遍的現象。王夫之（1619—1692）《古詩評選》便經常以“情”來論定詩作之佳否。當中涉及以“情”來評論詩作的多達 156 首，相比其他常用詞如氣（69 首）、意（74 首）、理（47 首）等，多出一倍以上。而陶淵明恰恰在王夫之眼中具有“真情”，故其評陶淵明《和郭主簿》謂：“寫景淨，言情深。”<sup>②</sup>評《飲酒》詩謂：“如此情至、理至、氣至之作，定為傑作。”<sup>③</sup>同樣欣賞陶淵明“真情”的，還有吳喬，他認為陶淵明的“涵冶性情”與杜甫的“忠君愛國”最能發揚《詩經》以來的優良傳統：“詩如陶淵明之涵冶性情，杜子美之憂君愛國者，契于《三百篇》，上也。”<sup>④</sup>從吳喬把陶淵明與杜甫相提並論，而且以陶淵明為“涵冶性情”之代表可見，陶淵明“性情”之“真”在清初詩壇上地位頗高。

## （二）真理

張健在《清代詩學研究》中嘗言：“站在儒家詩學立場上看，明代儒家詩學的政教傳統，無論是七子派的詩學中還是公安、竟陵派的詩學中都失落了。前後七子倡導的復古，只是漢魏盛唐的審美傳統，而不是政教傳統；而公安、竟陵提倡性靈，並不是人的道德本性，而是偏向於人的

① 《原詩》，頁 52。

② 《古詩評選》，頁 718。

③ 同上，頁 720。

④ 《圍爐詩話》，《清詩話續編》，頁 474。